

中美慈善清华论道 开启全球华人慈善研究新篇章

撰稿人：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 邢菁华、刘宣佑

2018年6月27至28日，“全球华人慈善行动—清华论坛”在荷风送爽的清华园隆重举办。来自中国、美国、德国、英国、新加坡等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领导、慈善研究专家、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为慈善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慈善家、企业家与基金会，共计200余位嘉宾齐聚一堂，共襄盛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谭天星、清华大学校长邱勇教授、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教授、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校长 Gene D. Block 教授和副校长范芝芬教授、美国尔湾加州大学副校长 Brian T. Hervey 教授，及多位院长和知名学者等出席此次活动并发言。同时应邀出席的还有中美两国重量级的慈善家和基金会负责人，如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美国 SupChina 总裁郑安澜、美国 Highridge Partners 公司创始人兼总裁梁仕源，弘康人寿保险董事长卢德之，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涛、怡海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琳达、美国洛杉矶亚美公义促进中心创始人和主席郭志明等。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龙登高教授和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亚太中心主任周敏教授共同主持本次论坛。

“全球华人慈善行动—清华论坛”旨在弘扬华人慈善精神和华商社会责任，彰显华人慈善对世界繁荣与和平所作的卓越贡献；通过建立平台，为全球华人慈善家、业内人士、学术研究者 and 政府决策者提供互动、交流与合作机会，促进两国华人慈善事业的发展。



邱勇校长、Gene D. Block 校长和与会嘉宾合影留念

27日，清华大学为与会的海内外嘉宾举行了招待会，清华大学校长邱勇教授、洛杉矶加州大学校长 Gene D. Block 教授与全体特邀嘉宾合影，并先后致欢迎辞，欢迎远道而来的各位嘉宾出席全球华人慈善行动—清华论坛，对热心公益、关注慈善、回馈社会的精神和善举表达了感谢，希望以此次论坛为契机促进两校之间、中美之间的相关交流合作。文化的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古往今来，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创造，而世界慈善文化正是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中形成了今日的丰富、多元。

28日，论坛在象征着中美慈善文化交流成果的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举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谭天星、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校长 Gene D. Block 教授、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



A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谭天星在致辞中高度评价了本次论坛，认为它体现了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以及世界华人对慈善事业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他说，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历来重视慈善事业的重要作用，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慈善公益事业迈上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完善慈善事业制度，这些都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保证。在慈善全球化的今天，本次论坛将推动国际合作互鉴，凝聚华人慈善家、学者、企业家的智慧和力量，弘扬华人慈善的精神，提升华商的社会责任，增进各方对慈善事业的了解和共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谭天星表示，中央统战部将继续关心支持海外侨胞的生存和发展，关注华侨华人慈善事业的发展。他希望华人慈善组织继续积极融入世界慈善公益事业，实现民心相通，增进人类共同的福祉。



C 杨斌教授在致辞中表示，中华慈善文化源远流长，在全球范围内，华人群体为慈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事迹，向世界彰显了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清华 107 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一所大学的成长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怀、支持，而一所好的大学更应以培养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为己任。在刚刚结束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中国已向世界发出了声音：“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各国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华慈善传统”为核心，联合海内外各方力量，加强不同文明间沟通交流，释放华人群体巨大潜力，是消除贫困、增进繁荣、提高生活质量、营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中美两国知名高校联手必将推动全球华人慈善事业和相关学术研究达到新高度。



B Gene D. Block 教授在致辞中表示，中美华人慈善事业正在高速发展，从 2008 到 2014 年，华人捐赠翻了五番，在 2000 到 2014 年间，华人基金会从 300 家增长到 1300 家。以王文祥夫妇为代表的洛杉矶加州大学华人校友在过去几年一直积极致力于慈善事业的发展，慷慨资助了众多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学生和研究机构，也积极推动了中美两国的关系发展。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全球化发展和世界的未来有赖于社会各界对慈善公益事业的不懈努力。



D 本次大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发布了《“全球华人慈善行动”首期研究报告》（以下简称“GCPI 首期报告”），更为后续全球华人慈善联盟的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GCPI 首期报告”由郭志明主席发布：报告中以 2006-2016 年间大量统计数据为基础，筛选出 60 位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和美国的捐赠一百万美元以上的华裔慈善家。分析他们的捐赠动因、目的和领域，从而归纳出中美两国华裔慈善家的捐赠趋势及其社会影响。其独特视角在于着重关注美籍华裔慈善家与居住在中国大陆、台湾和港澳的华人慈善家的捐赠趋势、动因和影响的比较，而不只是注重于单个国家（中国或美国）内的华人慈善事业。GCPI 首期项目的研究成果汇集在《中国及美国华裔慈善》(Chinese & Chinese American Philanthropy) 报告书中。后续研究将延伸拓展至东亚、东南亚以及全球其他地区的华人慈善事业。

此次论坛,形式多样,议题广泛,由三场高端对话、一场院长论坛和两场学术讨论共同构成。议题涉及“慈善、创新研究与人才培养”、“中国与海外华人慈善事业展望”、“新兴华人慈善事业”(善二代)、“慈善研究与高等教育”、“多样化的全球华人慈善模式”和“慈善研究的比较视角”等多个方向。以下分别阐述嘉宾演讲成果及其核心内容:



高端对话一:慈善、创新研究与人才培养

嘉宾(左起):陈启宗、郑安澜、梁仕源、卢德之、孟睿思、赵涛

本轮高端对话主要围绕嘉宾们的慈善捐款事业展开,分别谈到了他们各自的慈善行动及未来发展计划,探讨中美慈善家合作的可能性,以及中美慈善家的捐赠偏好比较,同时也涉及到中国新颁布的《慈善法》和慈善事业的挑战等诸多问题。

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首先探讨了慈善的意义,他认为捐款是能带来快乐而有意义的事情,为地球做更多善事是他一直以来探索和追求的目标。他谈到资助24座故宫宫殿复建和维护的动因来自于对世界珍贵遗产的保护,以及20年持续资助有音乐天赋的青少年使之成为有造诣音乐家的成长过程。同时,陈启宗就中美慈善捐款方向,以及差异化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中美双方互通与合作的必要性。

SupChina 创始人及总裁郑安澜介绍了她在慈善公益领域开展的主要工作,包括在过去十年通过百人会和亚洲学会资助新闻界,借助网络和新闻传媒平台让美国学生了解二战期间发生在南京大屠杀事件等。她同时提到正在推动全球环保问题以及女性和教育问题,并致力于通过媒体作为载体,加强中美的互信与合作,从而推动中美高层领导政策的制定,为世界和平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做出努力。

Highridge Partners 公司始创人及总裁梁仕源表达了自己对母校 UCLA 的感恩之情,这成为他热心于慈善公益

事业的起点。一开始他资助了 UCLA 房地产学科的研究,随着祖国经济的发展,他发起了尔湾加州大学梁氏美中研究院,以促进中美社会的相互理解。他认为,对大学的慈善资助是学术、教育和行业实践的最好结合。

弘康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回顾了他本人及其父亲创立的华民慈善基金会和卢嘉祥基金会十年来对全国上百所大学科研事业的慈善捐助,包括建立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等。他通过自己家族的历史认识到,财富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个人和家族的,而是属于社会的,因此做慈善已经成为他的爱好,同时提出了“共享文明”的目标。

山东步长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涛先生认为,人的物质需求是有限的,而精神需求是无限的,要通过回馈社会来实现。自2008年汶川地震后,赵涛组织了300名医生帮助受灾群众进行治疗和心理咨询,这是他投身慈善事业的开始。2009年,赵涛了解到,170个西藏儿童亟待进行先天性心脏病手术,他当即组织了200多名医生和180名志愿者赴西藏义诊。十年来,赵涛的团队共派出了一万多次的义务工作者,给50多万名藏民送去了医疗服务,现场救治白内障患者三千多名,先天性心脏病患者700多名,折合为诊疗费价值12亿元,得到中宣部的肯定和中央电视台的报道。赵涛认为在慈善行动中,心灵提升了,人的善被激发了,同时藏民感谢国家、政府,对民族

团结也起到很大的帮助。

怡海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琳达介绍了怡海公益基金会在包括基础教育、培训教育、老年大学等在内的“终生教育”领域的长期实践。怡海集团在全国建立了17所学校,在8个省资助了800多位家境贫寒的高中生。尤其是怡海与多家世界名校合作、为汶川地震灾区倾力建设的北川中学,已经成为公益慈善界在四川灾后重建中的一面旗帜。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常务副院长潘庆中结合自己亲身接触和历史上的海外华人慈善家的事例,赞扬了他们对中国教育发展的贡献,并展望未来,认为本次论坛将成为全球华人慈善行动的一个转折点,华人慈善事业将发挥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他比较了欧美企业家和华人企业家对慈善项目的选择偏好,指出欧美企业家更重视支持对科学研究等软件的投入,这种慈善资助甚至可能直接改变文明的进程。而中国的企业家更喜欢捐大楼,要把自己或企业的名字写

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设施上。不过,近年来华人慈善的发展趋势很好,以苏世民书院为例,海外华人、清华校友和国内企业家也大量捐款,在捐款数额和国际化意识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新加坡世界未来基金会联合创始人及首任秘书长陆波分享了他和中国的一批企业家在新加坡发起成立中国企业家在海外注册和运营的第一家公益性基金会的经验,以及对“走出去”的研究心得。他认为中外慈善事业有两点不同。第一,中国的大慈善家基本上都是第一代的创业家,他们的时间精力有限、慈善经验不多,而国外的大慈善家很多已经是第三代、第四代甚至第五代的慈善家,时间充裕、经验丰富,可以大部分时间专注在公益慈善上。为此,中国需要培养更多的职业公益经理人,这样才能与慈善家共同推进中国的慈善事业。第二,中国的慈善家参与国际慈善事业的比例还比较低。根据2014年的研究,中国4005家注册的慈善基金会中,在资金、项目、人员、机构、



高端对话二:中国与海外华人慈善事业展望

嘉宾(左起):王琳达、潘庆中、陆波、沈东曙、苗绿

品牌这五个层面,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国际事务的基金会只有37家,只占0.92%,与美国这样的慈善大国相比,中国慈善的国际化程度是有很大差距的。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沈东曙介绍了自己投身慈善事业的心路历程,他认为公益慈善决不仅仅是锦上添花的东西,而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力量之一。他强调公益企业的创新性,主张发挥社会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以改善慈善领域的现状。在亲自参与创办公益性的家政公司、小额金融公司和幼儿园的同时,他还通过国际合作和知识传播,积极推动中国商业界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之一,



G 高端对话三：新兴华人慈善事业

嘉宾(左起): 牛犇、张君婷、梁为功、陈玉馨、陈文扬、梁琦虹

并努力构建中国社会创新知识网络。

关于“新兴华人慈善事业”(善二代)，南加州大学陈曾熙夫人职能科学与治疗学部临床职业治疗助理教授陈文扬表示，作为第二代企业家和慈善家，他长期跟随父亲陈启宗参与各种慈善活动。随着自身阅历的增加，他也领悟到慈善活动对于完善自我、贡献社会的重要意义。

励嫫中国联合创始人及总裁陈玉馨自从参与一家慈善NGO在尼泊尔的妇女权益项目之后，就开始积极推动在中国推广妇女权益事业。2013年她创办励英中国，致力于在教育、技术、企业家精神等方面帮助女性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荣程集团副总裁、荣程普济基金会理事张君婷认为，二代

企业家和慈善家需要传承父辈回馈社会的价值观。在她留学归国后，就开展了教育公益项目和社会企业家项目，通过授人以渔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

北京老牛兄妹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牛犇深受父亲牛根生的影响，深知“达则兼济天下”，“财富越大，责任越大”的道理，在父亲捐出全部身家成立老牛基金会之后，他也与妹妹一起于2015年成立了老牛兄妹公益基金会，承担起第二代自己的一份责任。

美国唐仲英基金会的执行董事梁为功认为，第一代和第二代慈善家具有同样的使命，但所使用的工具和方法可能不一样。年轻慈善家更善于运用数据分析等现代化的技术来更好地从事公益事业，并在公益事业的经营中发挥资产管理、项目管理、风险管理等企业家才能。



H 院长论坛：慈善研究与高等教育

嘉宾(左起)：John Sonego、黄浩明、李萍、Bill Maurer、周敏

在下午的院长论坛上，中美名校的有关学院负责人就“慈善研究与高等教育”做了精彩发言。尔湾加州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Bill Maurer 教授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指出，慈善行为的变迁与过去十多年中科技的进步息息相关，例如移动支付手段的出现就导致在中国做慈善的方式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对于慈善的学术研究应当注重科技进步和社会变革带来的影响。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基地主任、原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李萍教授作为一位伦理学者，很早就认识到中国有着非常深厚的慈善文化。她指出，中美两国在慈善领域存在着文化差异，中国文化注重“慈心”，即如何更好地传递善意，美国文化注重“善事”，即如何更好地达成善果。因此美国式的慈善管理就更加细致和理性化。此外，中美两国在慈善制度上也存在很大的不同，在美国无论捐赠金额大小，都能获得税收上的优惠，因此美国

的税收制度对全民参与慈善捐赠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一点也值得中国借鉴。

国际公益学院副院长黄浩明曾任职原国务院矿业部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后来转入慈善NGO行业。他的研究兴趣是社会治理及其政策制订，通过分析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社会价值、行为模式和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博弈过程，来了解如何更好地协调有关各方来推动社会发展，在这种研究中，美国和中国在慈善方面的共性和差异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南加州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 John Sonego 介绍了南加州大学“提升整个人类生活水平”的宗旨，认为该校的中国留学生在回国后为提升中国的公共政策水平做出了贡献，而来自中国的慈善家也对该校的健康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很多捐赠，体现了美国高等教育与中国社会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

学术论坛 I: 多样化的全球华人慈善模式

学术论坛中,与会专家完整呈现了各自研究成果。首先,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龙登高教授和副主任邢菁华博士分享了他们对公共设施的传统公益模式研究。他们从传统中国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切入,以保存至今的福建宋代古桥、湖南廊桥、茶亭等为例,证明了中国也具有悠久深厚的公益传统和慈善文化,既非政府、又非企业的民间自发组织就成为中华传统慈善的制度基础。这种公益形态既不同于英美的企业主导,也不同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包办,表现了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的组织活力。传统民间组织不仅兴修公共设施,还兴办教育,如岳麓书院、武训义学就是其中著名的案例。海外华人浸润于中华传统文化,同样具备强大的自组织能力,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慈善公益组织。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副所长张秀明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对中国慈善事业的贡献。她指出,近年来,华侨华人慈善捐赠数额不断攀高,并从捐赠目标地区以侨乡为主变为辐射全国,特别是近些年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从以教育为主发展到救灾扶贫体育文化等多种领域。尤为重要的是,海外华人的慈善捐赠赓续了中国传统慈善文化,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起到了示范和带头作用。

美国罗格斯大学华民研究中心主任黄建忠教授和美国罗格斯大学华民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张丛丛博士探讨了中国富豪捐赠的影响因素,得出结论认为资产数额、行业类型(房地产和科技行业)、领导地位等因素对中国富豪的捐赠行为有显著的影响,而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个人特质对捐赠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电子科技大学慈善与社会企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冯天丽副教授的研究关注于慈善行为的制度逻辑及其演进。随着中国慈善事业向纵深发展,慈善家们关心的不再仅仅是把钱捐出去,他们开始认识到并专注于慈善对社会的长期影响。在此背景下,慈善公益事业发展成为“第四产业”。与其他产业不同的是,这一新兴的产业实体并不追求最大化的财务回报,而是要提供社会效益,并且通过投资社会资本增加社会福祉。在这一新兴产业中,兴起了大量社会企业,成为培育和发展社会治理能力的核心力量。冯天丽副教授所研究的制度逻辑指的是赋予特定目标和实践合法性的共享意义系统,包括总体原则性的价值观信仰和经验假设。

对于社会企业而言,制度逻辑是将社会福利、商业目标、社会逻辑和市场逻辑整合到一个组织的核心价值观当中,协调两者之间相互竞争的要求。通过对服务于老年人护理的公益组织进行案例研究,用数据说明了中国社会企业制度逻辑是一个动态的变迁过程,社会逻辑和商业逻辑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由不平衡走向平衡。社会企业家的观念、行为和身份在这一过程中也有相应的变化。

学术论坛 II: 慈善研究的比较视角

本轮主题演讲中,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副教授报告了她对中美富人捐赠动机进行的比较研究。从现象上来看,中美在富豪个人捐赠方面有着很大的差距。美国的个人捐赠已经超过 GDP 的 2% 以上,而在中国个人捐赠还不到 GDP 的 0.2%。尽管中国大陆慈善家的捐赠额正在急剧增长,但相比国际而言总量仍然是非常小的。2018 年 100 名胡润排行榜上的大陆慈善家共计 200 亿元捐赠额,加起来还不如比尔·盖茨一笔捐赠的数量。这不仅仅是捐赠额的问题,而可能与我们的捐赠文化和习惯有关。在西方文化中,富人的合法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社会并不排斥贫富分化。在此前提下,由于富人能力更强,作为上帝财富的代理人,富人有义务为提高穷人的福祉做贡献。与西方的同类研究中提到的捐赠动机,如利他动机、自我责任动机、公益动机、免税等不同,贾西津副教授的研究识别出中国富人的捐赠动机包括社会目标、家国情怀、给予快乐、回馈的价值观等。中国富人并没有进入到西方从财富累积到财富使用的这种财富观的转型阶段,并没有将自己看做是对社会有道德义务的“财富看守人”。他们的捐赠实际上仍然一方面是基于对维护企业社会关系的战略考量,另一方面是出于其对社会朴素的情感认同和亏欠感。

南开大学朱健刚教授与广州公益慈善书院院长景燕春则以广东侨乡顺德为例,探讨华人移民慈善的动力机制。国外学者一般基于个人的道德、感情、信仰、家庭等来解释人的慈善动机,并不从集体的角度来解释。而从 19 世纪开始产生的顺德侨民丰富的民间公益社团,催生出了对慈善动机的另一种中国式的理解。顺德海外华人传统社团有不少都起源于将客死他乡的无主尸首运回家乡的“运棺网络”,后来它逐渐演变成现代社团。落叶归根的华人传统和爱国爱乡的家国情怀部分地解释了海外华人民间公益社团的兴起,但顺德移民慈善在社会富裕程度提高的情况下还能保持着强劲势头,已经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个体的情感表达,

而应该解释为海外华人社团组织化的推动,以及内地官方和民间全民动员式的劝募拉动整套机制的结果。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博士生郑文娟报告了她与 UCLA 社会学系博士生陈臻祥、UCLA 公共事务学院及亚美研究学系教授邓道明的合作研究成果,对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等不同华人社会的环保公益行为与公共参与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者们选取了处于不同国情之下的华人社会,在文化差异不大的情况下,研究了它们在环保意识上的分化程度。他们指出,在选择个人特征、文化背景和社区活动为变量之后,香港、台湾、新加坡的环保意识差距不大,而中国大陆在环保捐赠、环保组织参与、环保活动参与等方面都比较落后。例如一个在香港生活的人向环保机构捐款的可能性,就比一个在年龄、学历、性别等方面完全相同但居住在中国大陆的人捐款的可能性要高出 11 倍。近年来大陆在环保意识方面正在提高,但为了把这个意识更快地化作行动,研究者们建议环保机构要接近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年轻一代和有更多收入和闲暇的中产阶级,使他们愿意投入到环保、慈善等事业中来。

美国普渡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张瑞胜从历史的角度讲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开展农业慈善的一段往事——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1936 到 1942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发起了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当时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协和医科大学、南开大学等中国最顶尖大学都加入了这个项目。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早期进行的农村项目不同,他们不是直接提供食物或捐款,而是将慈善和社会改造两者结合,尝试将社会科学运用于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实践。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乡村建设实验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 1936 年到 1937 年通过资助著名教育家晏阳初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机构,在河北定县和山东济宁进行了一些基础科学和农业科学的试点项目,包括杀虫剂应用推广实验等。但由于日本的侵略,项目不得不从华北搬迁到了贵州定番,成立了一个面向全国农村服务培训中心,由此进入了项目的第二个阶段。即使对于当今的中国来说,这一跨学科、实验性的科学慈善项目也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该项目推广了很多农业高产技术,授人以渔,对中国农村的发展做出了切实的帮助。而且通过这一项目,即使是在艰苦的战乱时期,中国和农业的合作也没有中断,例如国际收割机公司在 1945 至 1948 年间,还给中国提供了非常多的农业设备。总结洛克菲勒乡村建设计划的经验和教训,张瑞胜认为,要做好慈善行业,一方面要与政府和学界保持合作,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既要尊重科学,又要将新技术、新平台带到基层,真正发挥作用。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社会学博士生史宇婷利用中国社会大型综合调查数据 CGSS2012 分析了互联网对中国中产阶级慈善捐赠的影响。数据显示,就有参与慈善捐赠者而言,客观中产阶级地位与主观中产阶级认同都对其捐赠金额有显著正效应,闲暇上网频率越高,捐赠金额越大,且对互联网的不同使用方式均缩小了客观阶层间的差异。中产阶级类型和对互联网的信息性使用之间存在对个人捐赠金额的交互效应,相对于老中产阶级,体制内新中产和体制外新中产对互联网有信息工具型使用习惯的,捐赠金额更大。史宇婷认为,对于公益慈善组织来说,如果要吸引和巩固中产阶级对慈善捐赠的积极参与,就必须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传播效应,但要十分注意避免出现具有极大破坏性的负面信息。



龙登高教授、周敏教授总结及倡议

最后,龙登高教授、周敏教授做了总结,并倡议在本次论坛基础上成立“全球华人慈善研究联盟”,致力于推动持续性的慈善研究和实践,建立两国慈善家的对话沟通平台,以研究成果为基础,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系列对外推广活动,为中美两国慈善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互动平台,共同面对和解决实践中的挑战和问题。

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和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亚太中心联合主办,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以及海内外多所大学的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和公益机构的大力支持。同时,感谢人民日报、新华社、CCTV、中新社、人民网、新华网、腾讯网、新浪网、搜狐网、星岛日报、大公报、SupChina、中国侨网、《中国侨商》等海内外媒体的鼎力相助。